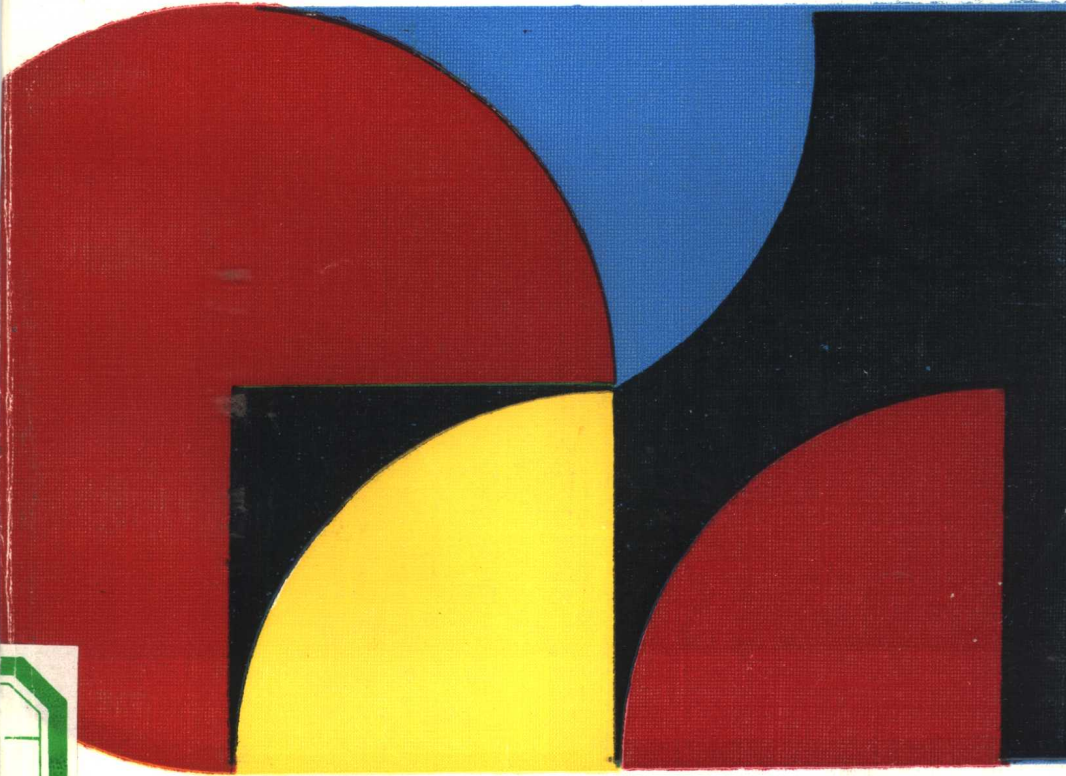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美国：经济生活与 教育改革

MEIGUO JINGJISHENGHUO YU JIAOYUGAI
GE



上海教育出版社

美国. 经济生活 与教育改革



[美] S·鲍尔斯 H·金蒂斯著
王佩雄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Samuel Bowles & Herbert Gintis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76
b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

〔美〕S·鲍尔斯 H·金蒂斯 著

王 佩 雄 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310,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 本

ISBN 7-5320-1431-2/G·1401 定价：5.55 元

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与教育 变革的关系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教育 观点略述(代译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教育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将起什么作用?当代教育变革的动力、方向和趋势是什么?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当代教育学者的普遍关注。S·鲍尔斯和H·金蒂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现书名《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即是对上述问题作出的一种解答。该书作者是两位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考察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美国中青年教育学者。他们从1968年开始,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历时7年,完成了这项统计和历史方法并重的研究工作。该书于1976年出版后,即受到西方教育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在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哲学领域均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评论这本书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为考察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提供了框架”的“最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作。因此,阅读这本书,不仅对于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变革情况,而且对于了解近些年来西方教育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和动向,都是会有帮助的。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独立,开始谋求发展;一些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的国家也希冀通过变革和振兴教育,走上现代化大道;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更是在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双峰对峙、实力竞争的世界格局中,急切要求重建战后经济,尽快增强政治竞争的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便成为战后各国发展的首要任务。及至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震动,西方观察家纷纷指出,其教育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对于教育投资的重视,是科技和经济实力日飞猛进的主要原因。于是,西方经济学家舒尔兹、鲍南、丹尼逊、哈比森和迈尔斯等人,在60年代初期相继进行“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工作,逐步形成了“教育投资必然带来经济增长”、“教育是打开现代化大门的锁匙”和“教育是促进社会改造的最好媒介”等观点,强调经济增长需要依靠教育。与这种经济学观点相呼应,西方传统的功能主义社会学观点也认为,国家不发达的原因,不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不平等,而在于个人缺少教育;发展教育,便能发展个人。通过提高个人的教育程度和知识技能水平,不仅能促进经济效率,而且也能扩大个人社会升迁的机会,从而使社会更趋平等化。因此,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事业一度出现了非常兴旺的景象。人们对教育充满了欣然自得的乐观主义情绪，相信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改良和个人升迁的良好药方。在美国，其时就有所谓“到学院去”的召唤，大有与当年美国移民进军西部，开拓边疆等量齐观之势。至60年代，这种兴旺发达的景象达到顶峰：教育经费增加，入学人数激增，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出现了免费学校(free school)*、开放录取或开放注册(open admission or enrolment)、补偿教育(compensatory education)和大课堂(open classroom)**等新的教育形式。

但到了70年代初期，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反越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和各種民权运动)相伴随，教育迅速堕入了“冰川时代”：厌学风骤起，入学率锐减，辍学率陡增，学业水平下降，校园骚乱与暴力事件不断，大量教育经费投放见不出效益，五花八门的教育改革未能奏效，遂使人们原先对于学校的期望、对于教育的热衷产生了动摇。人们不仅没有看到发展教育带来的经济增长，而且也看不到改革教育所带来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平等。

战后西方教育的跌宕起伏，不能不引起当代西方教育学者的认真思索。鲍尔斯和金蒂斯在谈到这项研究工作起因时说：“那时，由于看到了教育改革的大量矛盾，所以感到有责任对教育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再思考。”他们指

* 从历史上讲，免费学校是指免收学费的学校。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免费学校一词指不受课程、教育方法和压制性社会关系限制的学校。一般说来，免费学校立志于非正规教学、进步教育和师生关系的民主化等。——译者

** 能供几个班级同时使用的大型教学场所，尤见于初等和高等学校。重视学生自由和人际交往。——译者

出，战后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传统功能主义社会学观点的自由派人士认为，解决战后经济振兴和社会重建的两大办法是，一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二靠发展教育。发展教育在自由派社会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们看来，教育具有三大社会职能：一是统合职能，即通过学校教育，把一批又一批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统合到社会经济结构中去；二是平等化职能，即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部平等化机器，它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阶梯，不管社会背景如何，人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在这个阶梯上往上爬，接受教育越多，今后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地位就越高；三是发展职能，即教育能促进人的充分而圆满的发展。这三大职能在以自由派理论家杜威为代表的“民主学派”（Democratic School）那里是统一的，因为杜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民主的，在这种制度下，教育不但能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整合服务，而且也能促进社会平等和人的圆满发展。这三大职能在当代“技术决定-选优任能论学派”（Technocratic-Meritocratic School）那里也是统一的，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首先是一个技术系统，资本主义生产首先是一个技术过程。在这个系统和过程中，技术是决定一切的，社会平等必须服从于技术效率，社会公正必须以效绩、才能为标尺，优胜劣汰就是平等，以效绩、才能取人就是公正。因此，以传递知识技能为重点的英才主义教育，无疑是实现这三大社会职能的有效处方。

但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上述两个学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杜威只是虚拟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前提。过去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如进步教育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误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权力主

义的、等级制的和压制性的，而不是什么民主的。技术决定-选优任能论的观点则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成是一个纯技术过程，而没有同时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因而回避了生产的社会关系和与之对应的教育的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质，把教育看成是单纯提供认知技能的过程。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必然会受到社会阶级背景和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统计资料表明，智商、认知成绩与家庭背景对于个人所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其中家庭背景的变量无疑要重要得多。因此，教育具有平等化职能和促进人的充分而圆满发展的职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单就技术需要和认知技能而言，那种认为现代技术发展要求更高认知技能水平的观点，也并不可信。在现代生产中，事实表明，大多数职业所要求的认知技能水平并不很高。与认知技能的要求相比，在生产过程中，雇主更重视的倒是劳动者是否具有“合适”的个性品质，如能否遵章守则，能否服从命令，能不能将企业规范、准则内化，变为个人的“自觉”行动。雇主之所以采用教育水平作为筛选劳动者的主要标准，并不在于将它作为衡量雇佣对象的认知水平，而是作为鉴定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品质“适当”与否的标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学校教育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服务的，因而它也就很重视学生适应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个性品质的培养。这就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实质，撕碎了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中立”、“客观”，唯才能、效绩取人的面纱。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理论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平等主义教育政策不能改变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在60年代，美国开始推行种种社会福利和平等教育政策，企图改善

底层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联邦政府每年花费大笔经费为低层阶级学生进行补偿教育、特殊教育和双语教育等，但收效甚微，并没有改善低层阶级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用鲍尔斯和金蒂斯的观点来说，就是因为事实上学校教育不可能成为缩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工具，而只能成为再生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工具。

二

根据鲍尔斯和金蒂斯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等主义教育改革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原动力是对利润的追逐和资本的积累。追逐最大的利润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又需要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雇佣劳动力的源源不断的供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如美国独立战争至南北战争时期），工厂制度的确立，需要打破传统的小生产经济结构，把原来独立生产的劳动者纳入雇佣劳动制的轨道。到公司化资本主义阶段（如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就需要进一步把失去生产资料的移民劳动力和一部分土著居民吸收到雇佣劳动制中来。在公司化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期（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则需要把南部黑人、妇女和前一小康阶层如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及其他白领劳动者统合到雇佣劳动制中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主为了顺利地赚取高额利润，便把生产组织等级化，工作分割化，这样便可雇佣工资低的低技能劳动者，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控制劳动者。

因此，雇佣劳动制和劳动的等级制分工，是资本主义经

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与教育变革的关系

济结构的基石，也是维护和保持资本主义经济统治的必要条件。鲍尔斯和金蒂斯通过分析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发展史，雄辩地证明了，雇佣劳动制的出现和劳动的等级制分工形式的产生，不是出于技术效率的要求，而是出于资本家阶级为维护经济统治权力，榨取更大利润的需要。资本家虽然懂得，劳动者参与生产控制和管理，要比等级制的官僚化的劳动分工更有效率，但他们同样也了解，这样做很可能直接导致危害他们的统治权力。所以，劳动者真正参与生产的控制和管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根本办不到的。劳动的等级制的社会分工，是资产阶级统治权力赖以生存的命脉。这就决定了，受资本主义经济制约的学校教育，不可能培养有独立意识、有创造精神和民主参与意识的劳动者，而只能培养服从资本主义等级制权力关系并能自觉按资本主义企业规范和准则处世行事的驯服的劳动者。

在鲍尔斯和金蒂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在教育政策上的两大目标，一是劳动力的再生，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具体说来，学校根据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区分，为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人获得相应的职业地位，提供能胜任工作的知识技能；注意养成适合于等级制劳动分工需要的个性品质；帮助形成各种身份区别，加强成层意识，从而使经济不平等合法化。他们通过大量事实揭露，资本主义学校教育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阶级关系，反映到学校教育中来，而学校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如学校管理人员与教师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与知识的关系等），则摹写了劳动的等级制分工关系。学校向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学

生反复灌输浸透了统治阶级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知识，一到16岁，“大批儿童便被驱送到生产中去，这些人便成为工人和农民”；稍后，另一批劳动者从学校中“涌现出来”，去填补白领劳动者或较低级的管理人员职位；最后，从教育的顶层培养出了资本家、高层管理人员、政客和知识分子，教育系统就这样把学生作了对应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经济结构的区分。

鲍尔斯和金蒂斯进一步指出，既然学校教育对应于经济结构的不同层次，那么，在教育系统内部也自然存在着相应的等级。在工厂企业，最低层次的职业要求是遵守规则；中间层次职位强调可靠性，无须直接视导而能独立工作；高层职位则重视企业规范内化。与此相对应，在教育系统，低级层次如初、高级中学，应该严格限制和指导学生的活动；中级层次即社区学院，允许有较多的独立活动，较少直接督导；在顶层的四年制大学，则强调规范内化和行为自觉。这样，学校不同层次的教育工作就与生产部门不同层次工作的要求对应起来了。资本主义学校教育就是奉行这样一条“通过酬偿和激励学生逐级向上，然后把他们分配到职业等级系统中的显赫职位上去的英才教育”路线。这条路线企图使人们相信，所有学生都有希望超过别人，而决定能否成功的唯一因素是自己的智力才能。按照自由派教育理论，智商高低与教育成就有密切关系，而教育成就又与达到的职业阶层有关，故此，智商越高的人能力越强，事业成就越大，达到的阶层也越高。由于智商高低基本上是遗传决定的，所以阶层高的人智商高，其子女智商也高，将来的事业成就就大，从而达到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样便构成一种所谓“阶级自续”现象，而智商的遗传便是这种阶级自续过程的媒介和桥梁。鲍尔斯和金蒂斯指

出，这种说法是为资本主义等级化的“遗传效绩制”的社会统治秩序的合法化作辩解，其目的是要使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安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所接受的教育经验。

三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教育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对应，即对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需要。回顾资本主义教育发展史，每一次重大的教育变革，虽然都把“机会均等”作为自己的口号，但实际上，统治阶级却是把“社会控制”、“消融阶级冲突”和“资本主义等级制权力关系的合法化”作为主要目标的。正是基于这种观点，鲍尔斯和金蒂斯对美国教育史上的三次重大变革作了系统的分析。

第一次教育变革运动就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免费公立学校运动(Common School Movement)。19世纪以前，与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相一致，训练和培养儿童的任务，主要由家庭承担。那时的学校，如家庭幼儿学校(dame school)、书写算术学校(writing school)和慈善学校(charity school)等，仅起辅助的作用。独立战争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变化，到南北战争时期，家庭已不再是主要的生产单位，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新的劳动力培训体制——初等公立学校制度，以适应经济统合和社会控制的需要。鲍尔斯和金蒂斯以当时走在教育变革前面的教育家贺拉斯·曼教育思想的形成和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确立为例，说明免费公立学校运动表面看来是“进步的”——鼓吹初等学校课程标准化，使来自不同背景

的学生受到相同的教育，促进社会的平等化；但实际上却是“保守的”——重视道德教育，消除因经济急剧扩张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使学校教育起到“社会机器平衡轮”的作用。

第二次教育变革运动就是发生在1890年前后至1920年前后的进步教育运动(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由于其时公司资本的扩张，带来了雇佣结构、生产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再加上当时流行的“科学管理”和“社会效率”思潮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迫切要求建立与公司劳动等级制分工相适应的学校官僚体制，主张学校校董会由工商界精英和教育专业人员来控制，鼓吹教育管理制度的集中化和专业化。原先免费公立学校运动有关学校课程标准化、统一化的主张，这时受到了抨击。进步主义者要求学校课程与生活实际保持联系，适应学生的需要，加强中学课程的职业化和分轨化。这些做法对于当时公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最近一次教育变革运动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免费学校运动(Free School Movement)。如果说19世纪中叶的免费公立学校运动的重点在初等教育，20世纪初期的进步教育运动的重点在中等教育，那么这场教育变革运动的焦点则在高等教育。当时，美国已有50%的适龄学生进入中学后教育机构学习，因此，大学教育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再生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导致这场运动的原因，据鲍尔斯和金蒂斯的分析有三个方而：一是由于公司和国家工作部门的职业结构有了变化，白领低级专业人员的数量在增加，因而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有所提高；二是由于公司资本主义的扩张，白领劳动者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大批白领劳动者对被统合到雇

佣劳动制中去表示不满；三是少数民族和工人阶级子弟要求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故此，这场教育变革运动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结构的分层化和职业化，二年制社区学院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实行开放教育、教育民主、适应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反对学校教育的压抑性。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六、七十年代的教育解放运动的矛头已经不再是表面的不平等现象，而是各种不平等现象背后的权力主义的、压制性的和异化的社会关系。其时发生的波澜壮阔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和“非学校化”思潮的出现，即是这场斗争性质的明证。

由上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变革运动，实际上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反映。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资本积累(集中)与资本关系再生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对矛盾随时都有激化和引起冲突的可能。但是，资产阶级巧妙地将这对矛盾产生冲突的地点由工厂转移到了学校，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小对资本和利润的直接威胁和由此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可以使各种社会问题的阶级性质得以掩盖。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的手法是高明的，也是成功的。但反过来，我们也可看清，学校教育的矛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教育阵地往往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各类矛盾冲突和爆发的舞台，教育变革的时期也往往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阶级力量较量和整合的契机。

四

美国教育变革的原动力是什么？历来说法不一。有所谓“民主必需论”，即认为教育变革是适应民主政体的需要；有

所谓“民众需要教育论”，即认为民众对于教育的要求和为获得教育机会而进行的斗争促成了教育的变革；还有所谓“技术论”，即认为教育的变革是为了适应生产技能要求的提高和劳动力培训的需要。但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以上三种看法在美国教育发展史上都找不到任何依据。他们比较赞同“修正派”教育理论家的看法。“修正派”教育理论家认为，教育变革不过是统治阶级为维护 and 再生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克服文化多样性导致的社会冲突，而对劳动人民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的手段。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说明和揭露历次大的教育变革运动的起因和实质。

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指望通过这样的教育变革，建立平等而民主的教育制度，进而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平等化，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真正平等而民主的教育制度的建立，只能以经济生活的根本改造为前提。教育的解放运动必须与实现平等社会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废除私有制、劳动人民掌握生产控制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鲍尔斯和金蒂斯说：资本主义需要的“不是医生，而是殡葬员。”

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既不是浪漫主义的怀旧诗篇，更不是卢德主义的技术破坏和暴力流血，而是在现存制度下，运用社会主义教育策略，唤醒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和批判精神，逐步削弱资产阶级政权力量的广泛的民主社会运动。鲍尔斯和金蒂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策略，是指革命的教育工作者应当为实现学校的民主化而斗争，并把这种斗争与改变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需要的教育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着眼于培养全体劳动人民的“统一的阶级意识”，这样，就把实现教育民主、平等和自由的近期目

标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远目标联系在一起了。鲍尔斯和金蒂斯承认,对于整个社会的变革策略,他们还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指出这场斗争的变革方向和教育可以为之作出的努力。

五

在当代西方教育理论界,鲍尔斯和金蒂斯提出的“对应论”观点,即教育的社会关系对应于经济的社会关系,已经受到了广泛的重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曾指出:“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他又指出:“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1、634页)当代西方教育学者都认为,鲍尔斯和金蒂斯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本书为了行文通畅,均译为“再生”)理论和阶级观点,通过对资本主义学校教育及其变革实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客观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不仅培养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还具有再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职能;学校教育的社会化职能不仅在于使未来劳动者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习得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个性品质。

对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理论缺陷,当代西方教育学者的看法,也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在强调教育与经济存在

对应关系的同时，却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的矛盾的一面，因此，有关对应关系的分析是单向度的、简单化的。有的学者指出，鲍尔斯和金蒂斯虽然标榜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但实际上他们的理论倾向却是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观点。马克思本人也曾认为，教育等精神生产与社会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是不平衡的，而且，这种不平衡关系“在理解上还不是像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2页）可见，鲍尔斯和金蒂斯虽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学校教育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的理解，是肤浅的，不全面的。鲍尔斯和金蒂斯后来在谈到自己的理论贡献时，一方面再次肯定自己所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理论局限和不足，只看到教育与经济的对应方面，而没有对整个社会系统中教育与经济的复杂的矛盾关系，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本书前言、第一、二、五章由王佩雄翻译。第三、四章由丁静、王佩雄翻译。第六、七、八、九章由范国睿、王佩雄翻译。第十、十一章、附录A、B由操宏高翻译，第十、十一章由王佩雄校，附录A、B由赵永年校。全书由王佩雄通校。在全书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夏孝川副教授和华东师大其他教授的指教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对译文的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 佩 雄

1989年3月于华东师大丽娃河畔